

晚清石印舉業用書的生產與流通： 以 1880–1905 年的上海民營石印書局為中心的考察*

沈俊平

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

前言

舉業用書在唐代隨著科舉考試制度的確立便已開始出現，其內容則適應考試內容的更動而改變。¹在唐代，科舉考試包括多種科目，其中以進士科「尤為貴」，其考試項目包括詩、賦、時務策、明經策，²於是指導士子寫作詩賦用韻的韻書、韻圖、「詩格」與「賦格」著作、佳作彙編、佳句集錦，幫助士子熟記經文的「帖括」，供研習策用的類書等在當時坊間湧現，直到宋代還在陸續出版。王安石變法（1071）之前，規定進士科考詩、賦、論、策以及帖經。³書坊順應考生的要求，出版了幫助考生準備詩、賦、策、論等的闡墨彙編、韻書、「策括」、古文選本、通史節要、類書等舉業用書。⁴王安石變法之後，加試「經義」一項，⁵於是幫助考生了解經書意旨以及指導寫作經義文章的舉業用書應運而生。科舉考試在元初中斷，出版業陷入凋零的窘境，但在科舉考試恢復之後，圍繞著備考的書籍即刻登場。⁶「元仁宗皇慶初，復行科舉，仍用經義，而體式視宋為小變」。⁷指導士子寫作經義文章的舉業用書紛紛出

* 感謝匿名審稿人的詳細評論與寶貴建議，筆者獲益良多，於此特申謝忱。

¹ 周彥文：〈論歷代書目中的制舉類書籍〉，《書目季刊》第31卷第1期（1997年6月），頁1–3；劉祥光：〈印刷與考試：宋代考試用參考書初探〉，《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7期（2000年5月），頁59。

²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四四〈選舉志上〉，頁1166–68。

³ 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一五五〈選舉志一〉，頁3607–11。

⁴ 劉祥光：〈印刷與考試〉，頁57–90；劉祥光：〈宋代的時文刊本與考試文化〉，《臺大文史哲學報》第75期（2011年11月），頁35–86；祝尚書：《宋代科舉與文學考論》（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頁261–83。

⁵ 《宋史》，卷一五五〈選舉志一〉，頁3616–18。

⁶ 劉祥光：〈時文稿：科舉時代的考生必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22期（1996年9月），頁52。

⁷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卷一二〈經部書類二〉，頁105。

現，有倪士毅的《作義要訣》、涂潛生的《易義矜式》、林泉生的《詩義矜式》、王充耘的《書義矜式》等。除經義外，漢人、南人在首場還考「明經經疑」二問。⁸供這場考試用的的書籍有何異孫的《十一經問對》、陳天祥的《四書辨疑》、王充耘的《四書經疑貫通》、袁俊翁的《四書疑節》等。除此之外，書坊還出版三場闡墨與範文彙編、賦試範文選集、答策指導用書、類書等各種各樣的舉業用書。⁹

明代科舉考試三場，首場試四書義、經義，二場試論、判、詔、誥、章、表、內科，末場試經史時務策。¹⁰民間書坊順應考試內容與形式的要求，出版了四書五經講章、八股文選本、論策表試闡墨與範文選本、類書等各式各樣的舉業用書。¹¹

清代科舉考試，上承明制。¹²在艱辛的出版環境下，坊刻舉業用書的出版在經歷了清初的低潮後，逐漸呈上揚趨勢，其種類與明代如出一轍，並在道光年間出現「如山如海」的繁盛局面。¹³

隨著西學東漸，西方印刷術像石印和鉛印輸入中國。¹⁴石印術在出書速度、製作成本、印刷效果等具有木刻和鉛印所無可比擬的優勢，¹⁵加上最早採用石印術的點石齋業務蒸蒸日上，使得它成為晚清慣用的印刷術。不少石印書局都印行舉業用書，在科舉考試施行期間大獲其利，但在清廷下詔廢除科舉後紛紛停業或改業。

石印業的風行雖僅曇花一現，但在這短短的二十多年的時間裏，經歷了科舉舊制、改制乃至廢止的進程。面對這瞬息萬變、困難重重的時代，那些將業務重心放在出版舉業用書的書局，援引石印術的長處，出版了不可勝數的順應考試內容遞變的舉業用書，並通過有效的營銷方式與完善的銷售網絡，使得這類書籍鋪天蓋地地流通傳佈到全國各地。

⁸ 宋濂等：《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卷八一〈選舉志一〉，頁2018-19。

⁹ 沈俊平：〈元代坊刻考試用書的生產活動〉，《書目季刊》第44卷第2期（2010年9月），頁43-80。

¹⁰ 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七十〈選舉志二〉，頁1693-94。

¹¹ 沈俊平：《舉業津梁：明中葉以後坊刻制舉用書的生產與流通》（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9年），頁181-270。

¹² 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纂）：《清史稿校註》（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1986年），卷一一五〈選舉志三〉，頁3171-72。關於清朝科舉考試制度的承傳關係與發展情況，可參閱王德昭：《清代科舉制度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年），頁17-53。

¹³ 《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與人箋〉，頁344。

¹⁴ Cynthia Brokaw, "Commercial Woodblock Publishing in the Qing (1644-1911) and the Transition to Modern Print Technology," in *From Woodblocks to the Internet: Chinese Publishing and Print Culture in Transition, circa 1800 to 2008*, ed. Cynthia Brokaw and Christopher A. Reed (Leiden: Brill, 2010), p. 44.

¹⁵ Christopher A. Reed, *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1937* (Vancouver, BC: UBC Press, 2004), p. 98.

晚清石印舉業用書可深究的問題相當多，限於篇幅，本文將焦點限定在民營石印書坊的發源地上海，考察自1880至1905這二十多年間民營書坊的石印舉業用書的崛起與發展、種類與變化，以及營銷與流通。¹⁶1880年(光緒六年)是石印書局出版首部舉業用參考書《康熙字典》的年份，故以此為考察起點；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是清廷下詔廢止科舉制度的時間，故以此為考察終點。

石印舉業用書的興起與發展

民營出版社出現以前，書籍出版主要仰賴舊式書坊採用雕版印刷術來進行。隨著西學東漸，西方印刷術傳入中國，舊式書坊雖然繼續刻書，但在圖書事業的作用已大幅下降。¹⁷1872年4月，英商美查(Ernest Major, 1841–1908)與友人合資創辦《申報》。¹⁸除出版報紙，申報館也承印圖書。它最早出版的即是遭受不少朝野有識之士圍剿，卻又深受考生推崇的舉業用書。

舉業用書問世以來，朝野人士為之側目。為矯正這類書籍所帶來的不良影響，宋、明以及清初一度加以查禁，於「刊書之處，遍為飭禁等語」。¹⁹但所頒布的禁令，往往影響一時，無法維持長久，成效有限。發展到雍、乾交際年間，甚至出現「時文選本，汗牛充棟」的盛況。²⁰龔自珍(1792–1841)曾用「如山如海」來形容他所目睹的道光年間舉業用書的出版盛況。²¹民國初年詩人劉禹生(1873–1952)發現，從咸豐以至光緒中葉崇尚實學的氛圍中，仍存在「人崇墨卷，士不讀書」的劣風。²²凡此種種，不僅說明坊刻舉業用書刊行之盛、流通之廣，「山僻小鎮」皆有這類讀物的蹤跡，²³也說明在厚利之下，儘管「刊書之處」「遍為飭禁等語」，還是有書坊主視若不見，甘冒懲處的危險刊行舉業用書。

¹⁶ 本文所用材料，大體以民營書局的營業書目、《申報》刊登的新書啟事和告白為基礎，再補充以清代科舉與出版的相關史料，舉凡官書、正史、奏疏、地方誌、野史、文集、筆記、小說、回憶錄，並融匯多年來大陸、香港、臺灣及西方前輩學者在社會史、經濟史、教育史和出版史，尤其是清代部分所取得的成果。

¹⁷ Reed, *Gutenberg in Shanghai*, p. 98.

¹⁸ 關於《申報》的創辦、發展與影響，可參閱《申報》，25000號(1947年9月20日)，〈本報原始〉，17版；徐載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報史料》(北京：新華出版社，1988年)，頁2–3。

¹⁹ 杜受田等：《欽定科場條例》，《歷代科舉文獻集成》本(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卷三四〈禁止刊賣刪經時務策〉，頁2670。

²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九十〈集部總集類五〉，頁1729。

²¹ 龔自珍：〈與人箋〉，頁344。

²² 劉禹生：《世載堂雜憶》(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清代之教學〉，頁3、13。

²³ 實錄館(修纂)、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整理)：《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乾隆五十八年七月戊午，頁163。

舊式書坊出版舉業用書的成功經驗，讓申報館意識到商機，於是在光緒三年（1877）六月採用鉛活字推出一部收錄「近時新出」制藝文的《文苑菁華》，從中獲得豐厚的收益。²⁴申報館覺察到鉛印的印刷效果不盡理想，故「在泰西購得新式石印機器一付，照印各式書畫」，不僅「皆能與原本不爽錙銖，且神采更覺煥發。至照成縮本，尤極精工」，且「行列井然，不費目力」。²⁵這部機器來到申報館後，美查便成立了點石齋書畫室，成為近代中國最早採用石印術進行商業性出版的企業。²⁶申報館出版書籍，「出發點還是為了發展營業，目的不外就是謀利盈利」。²⁷申報館和點石齋分別承擔印刷鉛印書和石印書的任務。²⁸

以往刻一副版，賣多少刷多少。好賣的書不僅可早些收回本錢和盈利，又可根據市場需要進行印刷至版片不堪再用為止，²⁹若眼光獨到的話都不至於蝕本。石印就不同了，印少了成本高，利潤低；印多了賣不完，可能血本無歸。這兩者促使石印書店必須在選題上謹慎將事。出版者確立選題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對時代趨向的探測，對目標讀者的定位，對市場需求的估計等。明末清初名士顧炎武（1613–1682）曾粗略統計文生員的數字，指出：「合天下之生員，縣以三百計，不下五十萬人。」³⁰據張仲禮統計，太平天國前的文生員總數約五十三萬，與顧炎武的估算頗為接近，太平天國後增加百分之二十一，約六十四萬。³¹這數目上逾六十萬的生員是舉業用書的基本讀者，從這裏可窺探到舉業用書的龐大市場。考試是改變一個人命運地位的重要途徑，當時熱衷於功名的人「忙於奔走鑽營，博取富貴。一般學子，則從事試帖制藝，迷戀於科舉一途」。³²如何脫穎而出，如何應試才能中第，是士子心中最重要的問題，故而當時考生「平日所孜孜以求之者，不過三場程式、八股聲調、歷科試卷、高頭講章，以是為利祿之資，功名之券」。³³值得注意的是，貧寒家庭為了子弟與富

²⁴ 魯道夫·瓦格納（Rudolf G. Wagner）：〈申報館早期的書籍出版（1872–1875）〉，載陳平原、王德威、商偉（編）：《晚明與晚清：歷史傳承與文化創新》（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169–71。

²⁵ 《申報》，2170號（1879年5月18日），1版。

²⁶ 姚公鶴：《上海閒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12。

²⁷ 王建輝：〈申報館：報業之外的圖書出版〉，載王建輝：《出版與近代文明》（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118。

²⁸ 〈點石齋申昌書室廣告五件〉，載宋原放（主編）：《中國出版史料·近代部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三卷，頁207。

²⁹ 據繆詠禾的調查，一般上一副版片可印二三千次，之後筆畫就會模糊不清，不堪再用了。詳參繆詠禾：《明代出版史稿》（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307–8。

³⁰ 《顧亭林詩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一〈生員論上〉，頁21。

³¹ 張仲禮（著）、李榮昌（譯）：《中國紳士：關於其在十九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頁150–51。

³² 《申報》，25000號（1947年9月20日），〈本報原始〉，17版。

³³ 同上注，6086號（1890年4月2日），〈延師說〉，1版。

裕家庭子弟在科舉上競爭，也不惜花費讓子弟購買舉業用書以備考。像出身湖北鄉村貧困家庭的朱峙三（1886–1967），父親以行醫維持全家生計，家中負債累累。七歲入私塾後，朱峙三立志博取功名以擺脫貧困。當他聽聞黃州有考市，「武漢各大書店俱來黃州租屋趕考」，舉業用書的種類勢必齊備，機會難逢，立即與父親商量坐渡到黃州考市購買《時務通考》、《綱鑑》、《康熙字典》等書。家計雖然入不敷出，但為了兒子的前程，父親立即答應朱峙三的要求。³⁴這裡反映舉業用書的市場需求之大，故而出版這類圖書勢必能給民營書局帶來豐厚利潤，是當時民營書局力爭出版的陣地。晚清石印書店以射利為目的，在將以上的因素納入考量的同時，結合石印書的特點，乃將其中的一個選題確定在舉業用書上。

石印術是由傳教士帶進中國的，他們以傳播基督教為目的，其印刷品也以佈道小冊子為多。由於經費有限，他們想方設法降低印刷品的成本，曾就此進行了調查。他們曾以印刷兩千本中文《聖經》為基礎，估算了雕版、石印、活字印刷的成本，分別為1,900英鎊、1,261英鎊和1,498英鎊，得出石印最為便宜經濟的結論。³⁵據點石齋推算，石印兩百本不算裝訂錢，只需三十七元五角，³⁶故石印一本書的成本僅一角八分多。即使算上裝訂費，石印書的成本也相當低，書價也因而較木版書低廉。「以《康熙字典》售價為例：石印各種版本不同，自一元六角至三元。木版大字的售價至十五元」。³⁷一部木版書為同書石印本價格的二至五倍，因而石印書更受讀者歡迎。³⁸讓「點石齋石印第一獲利之書」的即是《康熙字典》，它「第一批印四萬部，不數月售罄。第二批印六萬部，適某科舉子北上會試，道出滬上，每名率購備五六部，以作自用及贈友之需，故又不數月而罄」。³⁹

此外，傳教士也發現：在不影響效果的情況下，石印可按需要印製出各種大小的書籍。⁴⁰點石齋在其刊登的啟事中突出了石印書的這個優點：「本齋用石印照相法所印各書，不特字樣縮小，以便行篋攜帶，並務求點畫分明，俾閱者不費目力，此

³⁴ 朱峙三（著）、章開沅（選輯）：〈朱峙三日記（連載第二）〉，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初十日，載中南地區辛亥革命史研究會、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編）：《辛亥革命史叢刊》第11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298。

³⁵ Typographus Sinensis, "Estimate of the proportionate expense of Xylography, Lithography, and Typography, as applied to Chinese printing; view of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each," *Chinese Repository* 3 (October 1834), pp. 246–48.

³⁶ 《申報》，2490號（1880年4月8日），1版。

³⁷ 上海《北華捷報》，1889年5月25日，見梁長洲（輯錄）：《近代各處印刷業情況》，載《中國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三卷，頁406。

³⁸ Reed, *Gutenberg in Shanghai*, pp. 101–2.

³⁹ 姚公鶴：《上海閒話》，頁12。

⁴⁰ Typographus Sinensis, "Estimate of the proportionate expense of Xylography, Lithography, and Typography," p. 249.

固久為海內文人所賞鑑，無待贅者。」說明石印本具有小而便攜、點畫分明的優點，以致「石印縮本書籍」，「每一書出，購者爭先恐後」。⁴¹

另外，小的石印冊子可在短時間內印成，約僅需雕版時間的十分之一，非常省時。⁴²申報館在其「招印時文」的啟事中宣稱石印「百頁之書」，約需「五日當可完工」。⁴³黃協塤(1851–1924)曾言石印「千百萬頁之書不難竟日而就」。⁴⁴乍看之下，似言過其實。不過，黃氏曾擔任《申報》總主筆八年，應當目睹過點石齋處理石印的過程，才有這樣的說法。同文書局備有石印機十二部，雇員五百人。以每部石印機每小時印刷幾百張計算，日夜不休，每日至少印刷數萬張不足為奇。舉業用書講究時機，注重時效，尤其像非常容易印製而又暢銷的本科鄉、會試闈墨，若石印書局將時機掌握得恰到好處，就能在眾多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搶佔市場先機，爭取到豐厚利潤。

韓琦、王揚宗指出：「起初，石印本多為士子學習應試的參考書。如《康熙字典》、《策學備纂》、《事類統編》、《佩文韻府》、《詩句解題總匯》之類。石印本印刷快捷，能印製十分清晰的袖珍小本，極便攜帶，故深受士子歡迎。這類書因需要量極大而印數很多，一些石印書局因此獲利甚巨。」⁴⁵販賣石印書的書商也獲利不少。《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描繪得罪上司而辭官的王伯述「改行販書」，「從上海買了石印書，販到京裏去，倒換些京板書出來，又換了石印的去。如此換上幾回，居然可以賺個對本利呢」。⁴⁶當時報章報道：「大部分〔石〕印的書字體都很小，奇怪的是居然有那麼多的人喜歡買這樣小的書。」其中「購買石印本的人大半是趕考的舉子，年輕，目力好，他們不要寬邊大字，而喜歡旅行時便於攜帶的小本。舉子們需要趕路，又喜歡帶書」。⁴⁷出版石印本的成本低，容許石印局以較木刻書更為低廉的價格出售，是石印本深受士子，特別是貧寒士子青睞的關鍵。只是這些石印縮本雖「極為精巧簡便」，「惟嫌字跡過於細小，殊耗精神，蓋久視則眼花，若用顯微鏡，又易于頭眩，則難經久，為經書家所不取，是亦美中不足耳！」⁴⁸（見圖一）

⁴¹ 《申報》，3558號(1883年3月12日)，1版；3655號(1883年6月17日)，1版。

⁴² Typographus Sinensis, "Estimate of the proportionate expense of Xylography, Lithography, and Typography," p. 249.

⁴³ 《申報》，1234號(1876年5月5日)，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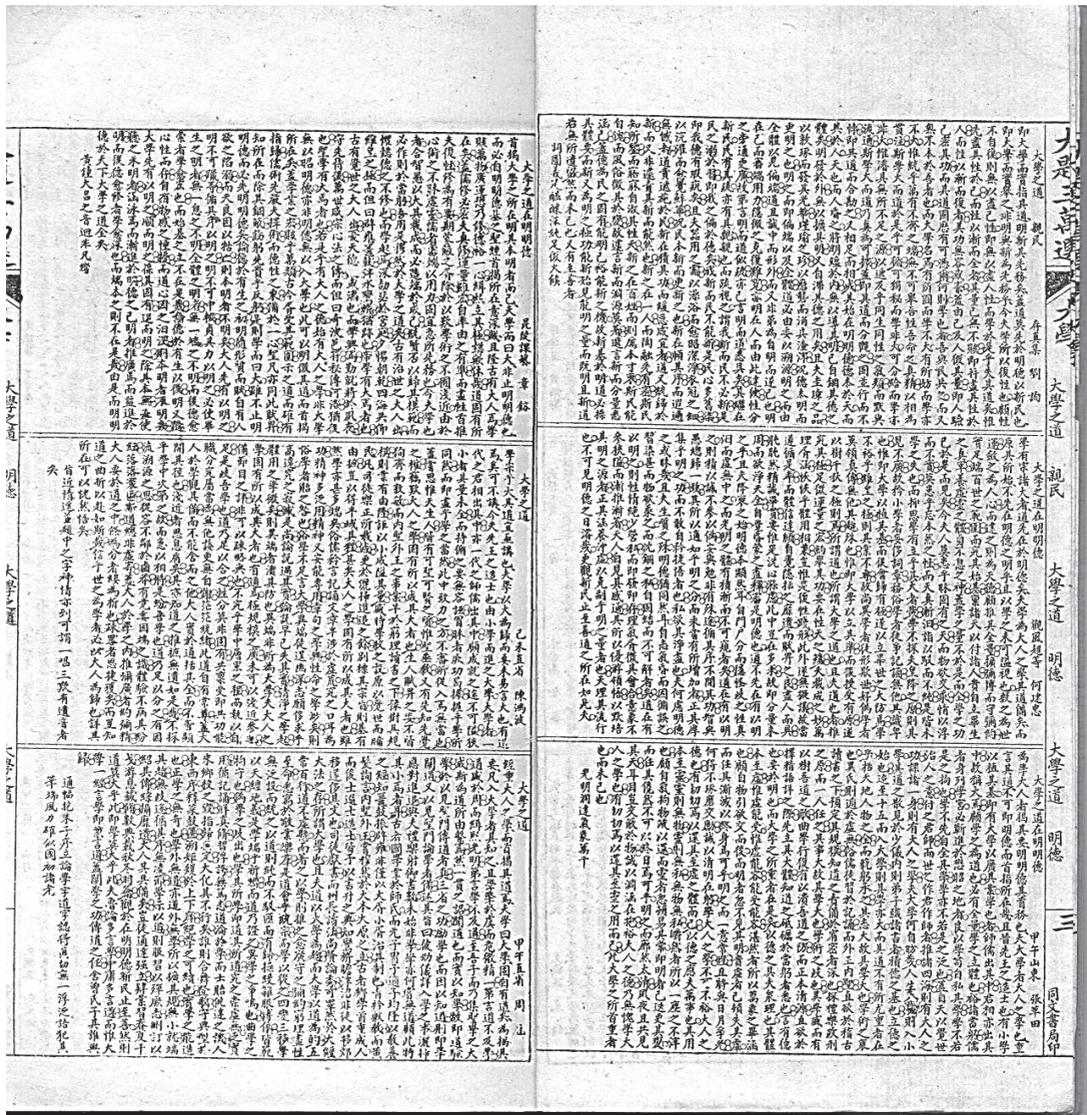
⁴⁴ 黃協塤：《淞南夢影錄》，《中國稀見地方史料集成》本(北京：學苑出版社，2010年)，卷二，頁365。

⁴⁵ 韓琦、王揚宗：〈石印術的傳入與興衰〉，載《中國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三卷，頁400。

⁴⁶ 吳趸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臺北：廣雅出版社，1984年)，第二十二回〈論狂士撩起憂國心，接電信再驚遊子魂〉，頁181。

⁴⁷ 上海《北華捷報》，1889年5月25日，見《近代各處印刷業情況》，頁406。

⁴⁸ 《新輯上海藝場景緻記》，《中國稀見地方史料集成》本，卷二〈石印書籍〉，頁245。



圖一：光緒十四年(1888)同文書局石印《大題三萬選》(版框高14公分，寬7公分)

這些翻開後面積僅有手掌般大小的微型舉業用書，除便於攜帶外，亦可供考生挾帶作弊。清政府為遏制這股惡風，頒佈了一整套嚴密的措施。⁴⁹然而，不論搜檢制度如何嚴格，也不論對違禁者懲處如何嚴厲，都不曾阻止挾帶作弊。相反，入闈挾

⁴⁹ 詳參杜受田等：《欽定科場條例》，卷二九〈關防·搜檢士子〉，頁2633-34。

帶之風日盛一日，手段也越來越巧妙。⁵⁰《清稗類鈔》有以下一段文字記述當時挾帶作弊的情形：

考試功令，不許夾帶片紙只字，大小一切考試皆然。……道、咸前，大小科場搜檢至嚴，有至解衣脫履者。同治以後，禁網漸寬，搜檢者不甚深究，於是詐偽百出。入場者，輒以石印小書濟之，或寫蠅頭書，私藏於果餅及衣帶中，並以所攜考籃酒壺與研之屬，皆為夾底而藏之，甚至有帽頂兩層韉底雙屨者。更有賄囑皂隸，冀免搜檢。至光緒壬午科，應京兆者至萬六千人，士子咸熙攘而來，但聞番役高唱搜過而已。至壬辰會試後，搜檢之例雖未廢，乃並此聲而無之矣。⁵¹

考生利用科場搜檢鬆弛的漏洞，挾帶石印書或蠅頭書進入試場，其手段可謂極盡刁鑽之能事。愈到後來，科場搜檢愈形同虛設，「由吏役高呼一聲搜過，掩耳盜鈴」，「後則此聲亦寂無聞，任士子之隨意挾書矣」。⁵²考生肆無忌憚將作弊工具像袖珍石印本帶入考場。在一定的程度上，石印書小而便攜的優點也助長縱容了挾帶作弊之風。

點石齋初創時，主要業務是翻刻楹聯、碑帖及名畫等傳統書畫作品，⁵³在光緒五年(1879)初石印《鴻雪因緣圖記》大賣後，才真正走向石印書籍出版的道路，並在光緒六年三月出版《康熙字典》而獲利甚巨，促使點石齋將重心投入在舉業用書的出版上。在二十多年的時間裏，生產了逾七十種舉業用書，掀起了一股石印的熱潮，石印書局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創設。黃協垣《淞南夢影錄》指出：「英人所設點石齋，獨擅其利者已四五年矣。近則甯人之拜石山房，粵人之同文書局，與之鼎足而三。甚矣利之所在，人爭趨之也！」⁵⁴

除點石齋、同文書局、拜石山房外，蜚英館、鴻文書局、積山書局及鴻寶齋石印書局等亦具影響力。這些書局「所印各書，無不勾心鬥角，各炫所長。大都字跡雖細若蠶絲，無不明同犀理。其裝潢之古雅，校對之精良，更不待言，誠書城之奇觀，文林之盛事也」。⁵⁵當時報章報導：「上海石印業很發達，其所印中國書以百萬

⁵⁰ 李國榮：〈清代科場夾帶作弊的防範措施〉，《中國考試》2004年第7期，頁36。

⁵¹ 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搜檢〉，頁586-87。據商衍鑾追憶：「入場搜檢，向例甚嚴，不許夾袋成文與書籍，以後較寬，不過循行故事而已。」見商衍鑾(著)、商志譚(校注)：《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及有關著作》(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年)，頁431-32。

⁵² 商衍鑾：《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及有關著作》，頁70。

⁵³ 參見點石齋在光緒四年(1878)十二月八日《申報》所載「楹聯出售」、光緒五年(1879)九月二日所載「續印楹聯立軸出售」、十月十三日所載「新印名畫出售」等啟事。

⁵⁴ 黃協垣：《淞南夢影錄》，卷二，頁365。

⁵⁵ 《申報》，4956號(1887年2月5日)，委宛書備(稿)：〈秘探石室〉，4版。

計。這種情形對原有的印書業打擊很大。」⁵⁶光緒年間，上海一地的石印書局至少有一百一十六家，⁵⁷主要聚集在四馬路棋盤街。⁵⁸此時上海出版業的昌盛，甚至凌駕北京之上，成為近代出版業的重心。⁵⁹據包天笑的了解，上海印刷所「有鉛印，有石印，那些開書坊店的老板（以紹興人居多數），雖然文學知識有限，而長袖善舞，看風使帆」。「他們的大宗生意，就是出了書，銷行內地到各處去」。⁶⁰除上海外，北京、天津、廣州、杭州、武昌、蘇州、寧波等地也趕搭這股石印熱潮，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紛紛開設了石印書局。⁶¹此時石印術的運用達到了頂點，一度還令印刷紙張供不應求。⁶²

這些石印書局除刊印古籍、小說、詩詞外，也大量出版舉業用書，如同文書局光緒十一年（1885）的石印書目收錄圖書六十種，其中如《各省課藝彙海》之類的舉業用書計三十二種，佔總量一半以上。蜚英館除印古籍名著、各種秘笈如《正續資治通鑿》、《三希堂法帖》、《段氏說文》外，也利用石印可放大縮小的技術，印製適應考生攜帶方便的「場屋用之挾帶書，所謂巾箱本之兔園冊子」，深受考生的歡迎。⁶³從光緒初年到科舉廢除之間，掃葉山房採用石印術翻印同光間本坊的刻本外，也繼承了同光間刊刻書籍的特點，「印行適於科舉考試的書籍最多。所印103種石印書籍中，諸如《四書院課藝》、《紫陽課藝》、《清朝文錄》、《直省鄉墨》之類的書籍共55種，佔總量的一半之上」。⁶⁴一些書局像鴻文書局，甚至專印舉業用書，如《五經匯解》、《大題文府》等類，不下數百種，便利當時士子獵取功名。在科舉改制前「曾風行一時，儒生幾乎人手一編」。⁶⁵

⁵⁶ 上海《北華捷報》，1889年1月30日，見《近代各處印刷業情況》，頁406。

⁵⁷ 吳永貴：《民國出版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頁90。若包括採用其他印刷技術刊印圖書的書局，以及外地、外國書局在上海所設分店，當時在上海知見的書局超過400多家。參閱張仲民：〈晚清上海書局名錄〉，載張仲民：《出版與文化政治：晚清的「衛生」書籍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頁321-24。

⁵⁸ 黎床臥讀生（輯）：《繪圖上海雜誌》，《中國稀見地方史料集成》本，卷六〈上海各業聚處〉，頁70。

⁵⁹ 吳永貴《民國出版史》通過七組數據來論證上海在晚清已發展成為中國出版的中心（頁86-91）。Reed在探討了1876至1905年間上海的石印業發展後，得出這時期為上海石印印刷商和出版商的黃金年代（the golden age of Shanghai's lithographic printer-publishers）的結論。見Reed, *Gutenberg in Shanghai*, pp. 88-127。

⁶⁰ 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香港：大華出版社，1971年），〈求友時代〉，頁148。

⁶¹ 韓琦、王揚宗：〈石印術的傳入與興衰〉，頁399。

⁶² 蔡盛琦：〈清末點石齋石印書局的興衰〉，《國史館學術集刊》第1期（2001年），頁27。

⁶³ 《申報》，4955號（1887年2月4日），〈藝林勝事〉，3版。

⁶⁴ 楊麗瑩：〈掃葉山房史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頁16、81。

⁶⁵ 秋翁：〈六十年前上海出版界怪現象〉，載《中國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三卷，頁267-68。

石印舉業用書的種類與演變

晚清石印業的風行時間並不長，卻見證了科舉制度的轉變進程。在這紛繁複雜、變化莫測的時代，石印書局順應考試內容更迭，編刊了林林總總的舉業用書來滿足考生的備考需要。下文將這一歷史時期舉業用書的演進過程劃分兩個階段進行論述。

科舉舊制下舉業用書的種類

清初鄉、會試的考試內容與明代相同，順治初年規定：鄉、會試「首場四書三題、五經各四題，士子各占一經」，「二場論一道，判五道，詔、誥、表內科一道，三場經史時務策五道」。「鄉、會試首場試八股文」。對八股文的寫作內容有嚴格的規定，要求以程朱理學為標準。⁶⁶此後，鄉、會試的考試內容多所調整，乾隆五十八年(1793)規定考試內容為：初場為四書文三篇、五言八韻詩一首；二場，五經文各一篇；三場，策問五道。這個規定一直維持到戊戌變法以前。以射利為目標的民營石印書局崛起後，配合考試內容與形式的規定和變動，以及考試著重的項目，生產了林林總總迎合考生備考需要的舉業用書。主要的幾類舉業用書包括：

一、闡墨：闡墨是幫助士子掌握考官好尚和時文風向的最佳途徑，商衍鑿指出：「八股謂之時文，亦以時過則遷，違時之舊文已去，合時之新文代興。」⁶⁷八股文風尚的微妙變化，就需要「揣摩」。《儒林外史》中的高翰林就深諳其中奧妙，他說：「老先生〔指萬中書〕，『揣摩』二字，就是這舉業的金針了。小弟鄉試的那三篇拙作，沒有一句話是杜撰，字字都是有來歷的，所以才得僥倖。若是不知道揣摩，就是聖人也是不中的。」⁶⁸要跟風趨時，剛出爐的鄉、會試三場闡墨在這方面就起著響導的作用。從咸豐以至光緒中葉，一些士子對闡墨趨之若鶩，出現「人崇墨卷，士不讀書」的劣風。清末小說《九尾龜》中的人物王伯深在「沒有中舉人的時候」，就曾「抱著一部直省闡墨，拼命揣摩」。⁶⁹朱峙三在日記中記錄他在光緒末年習舉業時所參考研習的圖書，除《康熙字典》、《綱鑑》、《應試必讀》、《四書義》、《時務通考》等外，也曾專心致志地鑽研坊間所購的各省闡墨。他讀畢壬寅和癸卯的闡墨後自嘲地說：「壬卯兩種墨卷，予讀之甚熟，自笑弋取科名者技止此而，故於古文少研究。」⁷⁰各書局自然不會忽視龐大的市場，往往在「鄉會試之年揭曉後，必趕印闡墨出售以饗諸君子

⁶⁶ 《清史稿校註》，卷一一五〈選舉志三〉，頁3171-72。

⁶⁷ 商衍鑿：《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及有關著作》，頁257。

⁶⁸ 吳敬梓：《儒林外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第四十九回〈翰林高談龍虎榜，中書冒占鳳凰池〉，頁563-64。

⁶⁹ 張春帆：《九尾龜》，《古本禁燬小說文庫》本（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0年），第六十四回〈章秋谷有心試名妓，王太史臨老入花叢〉，頁259。

⁷⁰ 〈朱峙三日記（連載第二）〉，光緒二十九年癸卯日，頁285。

先覩為快之心」。⁷¹點石齋成立後，也出版這類暢銷讀物，計有《乙酉科十八省闈墨》、《丙戌科會墨》、《國朝元魁墨萃》、《傳選戊子直省鄉墨》等。從江左書林的書籍發兌目錄，可知在當時坊間流通的這類讀物尚有《新選五科墨》、《鄉墨鴻裁》、《鄉墨金聲》、《鄉墨僅見》、《七科墨選》、《直省墨卷奪標》、《直省墨鯖集》等名目令人眼花撩亂的闈墨文集。⁷²

二、四書五經類：明代科考偏重首場，⁷³截至清末，科舉「雖分三場，而只重首場」的現象依然普遍。⁷⁴首場從四書五經中出題，故自明代以來，書坊編刊了多不勝數闡發四書五經意旨的講章，以及闡釋四書五經人物事物的參考書。舊式書坊刊印了明清文人編撰的這類圖書，其數極多。民營石印書局承續舊式書坊的作業方式，也編刊翻印了不少這類圖書。就發揮四書意旨的講章來說，汪鯉翔的《四書題鏡》和金澂的《四書味根錄》最受士子推崇。後來有文人將二書合併成《四書題鏡味根錄》，交託鴻文書局出版。此外，還有闡釋四書五經人物事物的參考書，其目的是要「使學者開拓其心胸，新鮮其耳目，廣闊其見聞，庶幾撰文者胸有成竹，左宜右有，詞源汨汨，而免空虛掙漏之患也」。⁷⁵這類書籍大多以類書形式編纂而成，其中以江永（1681–1872）的《四書人物典林》、閻其淵的《四書典制類聯音註》以及臧志仁的《四書人物類典串珠》最為重要。⁷⁶這些舉業用書是科舉改制前考生奉為圭臬的讀物，在版權意識薄弱的時代，是石印書局一窩蜂翻印的對象，像點石齋在出版這類圖書方面就相當專業，曾出版《四書味根錄》、《增補三層四書味根錄》、《增廣四書小題題鏡》、《五車樓五訂四書》、《四書撮言》、《四書古註群義彙解》、《四書典制類聯音註》、《四書典林》、《四書典故竅》、《四書圖考》、《五經體註》、《五經備旨》等。

三、八股時文：四書五經類參考書提供的僅是對經典的闡釋，對一些急功近利的士子來說並無吸引力，他們迫切需要的是一些像闈墨那樣直接允許他們揣摩取法的舉業用書。但闈墨所能提供的篇數離賅備甚遠，於是清代書坊也沿襲明代書坊的傳統，刊行八股時文彙編來滿足士子的備考需要。「自石印之法行而刊制藝以供揣摩

⁷¹ 《申報》，5959號（1889年11月19日），1版。

⁷² 江左書林（編）：《江左書林書籍發兌》，《中國近代古籍出版發行史料叢刊》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頁588–93。

⁷³ 《四庫全書總目》，卷三七〈經部四書類存目〉，頁310。

⁷⁴ 闕名：〈變通文武考試舊章說〉，載高時良（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頁616。關於明清科考重首場考試的論述，可參閱侯美珍：〈明清科舉取士「重首場」現象的探討〉，《臺大中文學報》第23期（2005年12月），頁323–68。

⁷⁵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頁1000。

⁷⁶ 沈俊平：〈清代坊刻四書舉業用書的生產活動〉，《漢學研究》第30卷第3期（2012年9月），頁230–44。

者」，亦「幾於汗牛充棟」。⁷⁷光緒末年，一些士子甚至「專攻制藝，不事經史」⁷⁸，「胸中之根柢，不過八股數十百篇」。⁷⁹只是這些文集「無論何文，並蓄兼收，但求備題」，故「不足以言選本也」。⁸⁰

八股時文分大題、小題兩類。戴名世云：「且夫制舉業者，其體亦分為二：曰大題，曰小題。小題者，場屋命題之所不及，而郡縣有司及督學使者之所以試童子者也。」⁸¹據戴氏所言，則大題用在鄉、會試，小題用在小試。大題的題意完整，又分連章題、全章題、數節題、一節題、數句題、單句題等等。當時有不少時文彙編以「大題」為名的，主要有《大題文府》、《大題觀海》、《大題鴻雋》、《大題多寶船》、《大題文富》等。⁸²

小題產生於成化之際，盛行於萬曆年間。⁸³小題在乾隆以前多用在童試，至乾隆初年方有較大的轉變。黃安濤(1777-1847)云：「乾隆間，會試、鄉試題多用搭截及小題。」⁸⁴乾隆九年(1744)，鑑於科場擬題、懷挾之風，順天鄉試遂出「略冷」之小題以防倖獲，這是小題從小試躋身鄉、會試之始。⁸⁵小題大概可分成兩類，一為題目割截、不完整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截搭題。截搭題應在萬曆年間小題盛行時順勢而生。科考所用截搭題，題目文字皆有上下相連、前後的關係，非可東抄西襲，拼湊成文。一為「褻而不經」者，題雖完整，然而意義不能冠冕正大，甚至詆毀孔孟，流於淫穢。兩者都因違背制藝乃為闡聖明道的本意，而為大雅所抨擊。然而，批評的聲浪雖不曾停歇，但小題不僅未被淘汰，更由於其在防止士子擬題、剽竊，以及提升考官的閱卷速度、鑑別文章高下等方面，有明顯的效果，故而在鄉、會試中益形重要。⁸⁶書局意識到重心的變遷，也生產大量的小題文集如《小題文府》、《小題森

⁷⁷ 《申報》，5682號(1889年2月15日)，〈歷代名稿彙選出書〉，4版。

⁷⁸ 劉大鵬(遺著)、喬志強(標注)：《退想齋日記》(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光緒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1897年10月21日)，頁76。

⁷⁹ 公奴(夏清貽)：〈金陵賣書記〉，載《中國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三卷，頁312。

⁸⁰ 商衍鑾：《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及有關著作》，頁259。

⁸¹ 戴名世(撰)、王樹民(編校)：《戴名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四〈己卯行書小題序〉，頁100。

⁸² 掃葉山房(編)：〈上海掃葉山房發兌石印書籍價目〉，載周振鶴(編)：《晚清營業書目》(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頁390-91。

⁸³ 侯美珍：〈明清科舉八股小題文研究〉，《臺大中文學報》第25期(2006年12月)，頁179-89。

⁸⁴ 梁章鉅(著)、陳居淵(點校)：《制藝叢話》(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卷二二，頁429。

⁸⁵ 王先謙：《東華續錄》，《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清刻本，1995年)，〈乾隆二十〉，頁5；侯美珍：〈明清科舉八股小題文研究〉，頁161。

⁸⁶ 侯美珍：〈明清科舉八股小題文研究〉，頁160-89。

寶》、《小題三萬選》、《小題四萬選》、《小題十萬選》、《小題珍珠船》、《小題宗海》、《小題目耕齋》、《小題正鵠》、《小題題鏡》、《小題多寶船》、《小題文藪》等來滿足士子備考的需要。⁸⁷更有題為「巧搭」、「小搭」、「長搭」、「搭截」者，如《巧搭文府》、《巧搭大觀》、《巧搭清新》、《巧搭網珊》、《小搭珠華》、《小搭徑寸珠》、《長搭一新》、《長搭正軌》、《搭截精華》、《搭截奪標》等。⁸⁸

四、試律詩：乾隆五十二年（1787），清廷在首場增加了五言八韻試律詩一項。功令頒行後，為應考生的急需，書坊乃大量刊行唐人試律詩選本，有前代人編撰的《唐省試詩》、《唐人五言排律詩論》，以及新編的唐人試律詩選本，如《試體唐詩》、《唐人應試六韻詩》等。⁸⁹隨著時間的推移，清人於試帖一道，法積久而大備，名家名作倍增，不少佳作哀集成帙，其中以紀昀（1724–1805）的《庚辰集》、《九家試帖》、《七家試帖》、《後九家詩》等最為重要。⁹⁰同、光以後，《庚辰集》等試律詩選本遭到士子冷落，取而代之的是在《上海鴻寶齋分局發兌各種石印書籍》傳單中所看到的《試律大成》、《試律大觀》、《試帖玉芙蓉》、《增廣玉芙蓉》、《試帖淵海》、《增廣試帖詩海》等試律詩選本。⁹¹

五、策學：清承明制，鄉、會試第三場試五道策問。雖說科考重首場，士子無需傾全力準備這場考試，但仍需對第三場考試做一些基本準備。而且殿試只試策問，試策優劣成為殿試高下的惟一依據，故而著眼於高中的考生，也不會忽視策問的研習。其中最取巧的方式是研習坊間層出不窮、五花八門的策學著作。清代出版的這類讀物不可勝數，較早的有《策學纂要》、《試策便覽》、《近科直省試策法程》、《時策精擬》等，但數量最大的還是光緒年間出版的策學著作，尤其是石印技術興起之後，出現了不少將策論要考到的知識進行分門別類的宏篇巨製像《策府統宗》和《策學備纂》等。《策府統宗》由劉昌齡等輯選，共六十五卷，分為經、史、子、集、吏、戶、禮、兵、刑、工、天文、地理十二部。內容絕大多數為傳統國學知識，僅天文、地理二部有部分西學知識。《策府統宗》在光緒中葉頗為盛行，出版這部書的石印書局有耕餘書屋、鴻文書局和蜚英館等。當時不少士子「買了一部《策府統宗》」後就「盡心摹仿」。⁹²《策府統宗》這部科舉時代的代表作還衍生出科舉改革前的《新纂策府統宗》（光緒十四年〔1888〕同文書局石印）、《新增廣策府統宗》（光緒二十年〔1894〕上海鴻文書局石印）、《廣策府統宗正續合編》（光緒二十年上海文盛堂

⁸⁷ 飛鴻閣（編）：〈上海飛鴻閣發兌西學各種石印書局〉，載《晚清營業書目》，頁418–19。

⁸⁸ 〈上海掃葉山房發兌石印書籍價目〉，頁394–95；《江左書林書籍發兌》，頁575–85。

⁸⁹ 丘怡瑄：〈紀昀的試律詩學〉（臺北：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頁62–69。

⁹⁰ 梁章鉅（著）、陳居淵（校點）：《試律叢話》（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例言〉，頁494；商衍鑾：《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及有關著作》，頁264–65。

⁹¹ 鴻寶齋分局（編）：〈上海鴻寶齋分局發兌各種石印書籍〉，載《晚清營業書目》，頁477–78。

⁹² 《九尾龜》，第六十四回〈章秋谷有心試名妓，王太史臨老入花叢〉，頁259。

石印)等。吳頴炎編輯的《策學備纂》規模更大，分作經部、史部、天算、方輿、帝學、……子部、集部、選學、藝文、考工等三十二門。內容豐富詳贍，無所不包，基本上涵蓋十九世紀以來中國因政治、社會、經濟變化所產生的問題，可供考生臨場面對類似策題時借鑑。《策學備纂》還一度成為光緒年間的暢銷書。⁹³

光緒十四年，有書商這樣說：「我國家鄉會取士首重文，次重詩，而策問又次之，故近來石印詩文等書之盛行於鄉會場者，以其取携最便而選擇至備者也，如頭場四書文之備題莫如《大題文府》，八韻詩之備題莫如《增廣試帖玉芙蓉》，二場五經文之備題莫如《經藝宏括》，三場策問之備題具莫如《新增策學總纂大成》、《羣策彙源》。凡此五部三場選本中所最精最備之要書也。」⁹⁴ 戊戌變法前，時人追憶：自石印之法流入中國後，「於是文則有《大〔題文府〕》、《小題文府》、《大題三萬選》，試帖則有《玉芙蓉十萬選》以及《經藝淵海》、《經策通纂》等類。舉凡考試所需者，無不觸類旁通，從心所欲」。⁹⁵「科舉既變，八股既廢」後，「《四書合講》、《詩韻合璧》、《大題文府》、《策府統宗》等，遂與飛蛇飛鼈、大麋大鹿，同為前世界之陳跡，不能不又有物焉代興其間也」。⁹⁶ 石印《四書合講》、《大題文府》、《大題三萬選》、《小題文府》、《經藝宏括》、《經藝淵海》、《詩韻合璧》、《增廣試帖玉芙蓉》、《玉芙蓉十萬選》、《策府統宗》、《新增策學總纂大成》、《羣策彙源》、《經策通纂》(包括《經學輯要》、《策學備纂》兩種)等書由於具有「選擇至備」、「觸類旁通，從心所欲」的優點，其袖珍體型也便於挾帶入闈，因而深受那些意欲投機取巧的士子歡迎，風靡一時。

從科舉改制至廢止期間的舉業用書的發展變化

清代科舉改革始於戊戌變法之時，中間一度復舊。⁹⁷ 光緒二十七年(1901)，清廷宣佈變通科舉考試，諭自明年始，正式廢止八股，改試策論，終止了自明代以來實行了五、六百年的制藝取士之法。翌年，會試分三場進行，頭場試中國政治史事論五篇，二場試各國政治藝學策五道，三場試四書義二篇、五經義一篇。進士朝考論疏、殿試策問，也都以中國政治史事及各國政治藝學命題。以上考試皆強調：凡四書、五經義，「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論均應切實敷陳，不得仍前空衍剽竊」。⁹⁸ 章

⁹³ 吳頴炎(編)：《策學備纂》，光緒十四年(1888)上海點石齋石印本；周振鶴：〈問策與對策〉，《讀書》1993年第3期，頁111-12。

⁹⁴ 《申報》，5441號(1888年6月13日)，4版。

⁹⁵ 《申報》，8770號(1897年9月15日)，〈論考試有夾帶為古今中外之通論〉，1版。

⁹⁶ 佚名：〈論譯書四時期〉，載張靜廬(輯)：《中國出版史料補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頁63-64。

⁹⁷ 《清稗類鈔》，〈考試改策論〉、〈考試復用八股文〉，頁595。

⁹⁸ 《清實錄》，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己卯，頁412。

清指出，策論在科舉改革中成為關注的焦點，與晚清「經世致用」思潮的興起密切相關。⁹⁹

清代從改科舉到廢科舉，取士的標準有一個變化的過程。廢科舉前的十餘年間，取士的標準已是鼓勵新舊學兼通。「年來各省書院、歲科考經解、策論莫不講求西學。近來鄉闈禮闈三場問對均以時務為重」。¹⁰⁰山西舉人劉大鵬(1857–1942)透露：「當此之時，中國之人競以洋務為先，士子學西學以求勝人。」¹⁰¹取士標準改變，士子所讀之書即隨之而變。¹⁰²時人描述：「近日書肆中時務之書汗牛充棟，其間有從西書中譯出者，有民間私箒由耳食而得者，純駁不一，但取其備。各士子之入肆爭購，睨而視之者，不啻蟻之附羶，蠅之逐臭，蓋非此不足以為枕中鴻秘也。」¹⁰³

傳教士也注意到，自江標於光緒二十年在湖南以新學考士，讀書人「遂取廣學會譯著各書，視為枕中鴻寶」。如《泰西新史攬要》、《中東戰紀本末》等皆是「談新學者」「不得不備之書」。¹⁰⁴廣學會初印譯作《格物探原》、《七國新學備要》、《天下五洲各大國志要》、《農學新法》等書時「人鮮顧問，往往隨處分贈」。至光緒十九年(1893)，新書銷售量僅銀洋八百餘元；光緒二十一年(1895)升至二千餘元；至光緒二十四年(1898)，新書的銷售額躍至一萬八千餘元，是五年前的二十倍，「幾於四海風行」。¹⁰⁵

買書者如此，賣書者亦然。因應於「採西學」、「重時務」的需求，晚清出版了多種西學彙編。¹⁰⁶《申報》對當時的出版業做出這樣的觀察：「書鋪之工於經營者，又能揣摩風氣，步步占先。如今科有三場出時務策題之說，於是將近人所著各書，分農學、礦學、算學、兵學以及聲、光、化、電諸學分門別類，綱舉目張。携赴考市，購者雲集，有朝成書而夕已告罄者。」¹⁰⁷由此可見西學彙編極受重視，故而考生不落人後地爭購這些讀物。民營書局像點石齋也爭相編刊西學讀物，這股熱潮持續至科

⁹⁹ 章清：〈「策問」與科舉體制下對「西學」的接引——以《中外策問大觀》為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8期(2007年12月)，頁77。

¹⁰⁰ 《申報》，8698號(1897年7月5日)，〈中西策學備纂〉，9版。

¹⁰¹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光緒二十三年四月十七日(1897年5月18日)，頁72。關於劉大鵬的生平，可參閱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s: One Man's Lif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 1857–1942*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¹⁰² 羅志田：〈清季科舉制改革的社會影響〉，載劉海峰(編)：《二十世紀科舉研究論文選編》(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642–43。

¹⁰³ 《申報》，8760號(1897年9月5日)，〈論考試之弊〉，1版。

¹⁰⁴ 《三湘喜報》，原載《萬國公報》第九十卷(光緒二十二年六月)，轉載自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上海：神州國光社，1953年)，第3冊，頁376。

¹⁰⁵ 顏誨：〈基督教文字播道事業談〉，載張靜廬(輯)：《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二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頁336。

¹⁰⁶ 章清：〈晚清西學「彙編」與本土回應〉，《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6期，頁48。

¹⁰⁷ 〈論考試有夾帶為古今中外之通論〉，1版。

舉廢止。劉大鵬在日記中透露：科舉改制後，「時務諸書，汗牛充棟，凡應試者均在書肆購買」，故書商也乘機「高擡其價」。¹⁰⁸其中不少以「西學」、「新學」、「時務」為名(參表一)。

表一：知見西學彙編

出版年份 (光緒)	書名	編者	出版社	卷數	門類
二十一年	西學大成	王西清、盧梯青	上海醉六堂	136	12
二十二年	萬國近政考略	鄒弢	上海書局	16	8
二十三年	西學二十種萃精	張之品	上海鴻文書局	20	20
	西學通考	胡兆鸞	不詳	36	36
	新輯西法策學匯源	顧其義、吳文藻	上海點石齋		
	時務通考	杞廬主人	上海點石齋	31	31
	中外時務策府統宗		上海文盛書局	44	
	萬國時務策學大全	漱石山館主人	積山書局	48	48
	萬國分類時務大成	錢豐	上海袖海山房	40	25
	中西算學大成	陳維祺	上海博文書局	100	28
二十四年	中西時務格致新編	廬山老人	上海書局	24	16
二十七年	時務通考續編	杞廬主人	上海點石齋	31	31
	皇朝新學類纂	廣益室主人	上海廣益書室		10
	時務通考	陳驥等	求賢講舍	82	11
二十八年	西學三通	袁宗濂、晏志清	上海文盛堂	508	3

《時務通考》在戊戌變法前一年六月出版，《申報》加以介紹云：「方今朝野上下皆以講求時務為急，而時務各書之總匯者惜無善本，僕等不惜重金，敦請名宿三年之力，採書五百餘種，成《時務通考》一書。」¹⁰⁹該書分三十一類，下分綱目，再下為條目，共有條目13,192條。《中外時務策府統宗》也在同時問世，文盛堂在出版啟事稱：「今科稟旨允准某侍御奏請鄉會三場策通時務，敝局特請精通西學諸友，復重輯《中外時務策府統宗》，廣搜課藝格物等書，上自天文、地志、國政、輿圖、軍戎、公法、交涉、禮節，以及農、工、商賈、算、化、動、植等學，得四十四卷。凡中外時務應有盡有，誠西學之統宗也。余不敢自言美善，蓋得此一部，可統西學叢書之用耳。」¹¹⁰

¹⁰⁸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光緒二十九年三月初六(1903年4月3日)，頁121。

¹⁰⁹ 《申報》，8713號(1897年7月20日)，5版。

¹¹⁰ 同上注，8721號(1897年7月28日)，〈新出石印《策學百萬卷類編》、《中外時務策府統宗》〉，9版。

此類圖書之中，以《時務通考》為最暢銷，「海內風行，揣摩家咸奉為圭臬」。像正在習舉業的朱峙三聽聞黃州有考市，立即趕去購買《時務通考》。「《時務通考》閱竣三分之二」後，使得他也「略知外國情況」，¹¹¹可見此書有助於士子了解國外情況，在科舉改制後仍具參考價值，推動了點石齋在四年後出版續集。¹¹²正、續兩編受人垂青，吸引一些奸商偷天換月，「勦襲菁華，改名翻印」。¹¹³申報館旗下的集成圖書局見有利可圖，遂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將正、續兩編併在一起重印出版。¹¹⁴

除西學彙編外，西學內容成分漸增的各種「經世文編」也是考生注意攻讀的對象。自魏源（1794–1857）、賀長齡（1785–1848）編纂的《皇朝經世文編》（1826）問世後，遵其宗旨、仿其體例的續編之作賡續不絕，到光緒二十九年的《皇朝蓄艾文編》為止，至少有二十種之多。¹¹⁵成書於光緒十四年葛士濬（1845–1895）的《皇朝經世文續編》是首先打破原書成例的續作。葛氏認為原書的許多內容已不敷時用，亟需變化以適應時代的變遷。於是葛氏在原書的八綱之外，專設「洋務」一綱，繫以洋務理論、邦交、軍政、教務、商務、固圉、培才七目。至此之後，「經世文編」的其他續作新學成分越來越多，舊學成分越來越少。¹¹⁶由於「經世文編」中所輯錄諸多文章的內容恰為當前時務，可資利用。而且，針對某一問題，「經世文編」往往羅列一種或多種建議，只要記誦相關內容，就能在考場上遊刃有餘地應付策問，故而成為大多數考生的必讀之書。像劉大鵬和民初教育家楊昌濟（1871–1920）等，都在日記中留下了備考期間日夕研讀《皇朝經世文編》及其續作的記錄。¹¹⁷八股廢除之後，策論在科

¹¹¹ 〈朱峙三日記（連載第二）〉，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初十日、閏五月二十九日，頁298–99。

¹¹² 《申報》，10283號（1901年12月2日），〈跋時務通考續編〉，3版。

¹¹³ 同上注，10257號（1901年11月6日），〈翻刻必究〉，3版。

¹¹⁴ 同上注，10991號（1903年11月23日），〈重印正續時務通考出售〉，1版。

¹¹⁵ 這些續編有張鵬飛《皇朝經世文編補》（1849）、饒玉成《皇朝經世文續集》（1881）、管窺居士《皇朝經世文續編》（1888）、葛士濬《皇朝經世文續編》（1888）、盛康《皇朝經世文續編》（1897）、陳忠倚《皇朝經世文三編》（1897）、求是齋主人《時務經世文分類文編》（1897）、甘韓《皇朝經世文新增時務洋務續編》（1897）、麥仲華《皇朝經世文新編》（1898）、求自強齋主人《皇朝經濟文編》（1901）、宜今室主人《皇朝經濟文新編》（1901）、邵之棠《皇朝經世文統編》（1901）、闕名《皇朝經世文統編》（1901）、何良棟《皇朝經世文四編》（1902）、金匱闕鑄補齋《皇朝經世文五編》（1902）、求是齋《皇朝經世文五編》（1902）、甘韓、楊鳳藻《皇朝經世文新編續集》（1902）、儲桂山《皇朝經世文續新編》（1902）、鄒玉賓《最新經世文編》（1902）、于寶軒《皇朝蓄艾文編》（1903）等。據黃克武：〈經世文編與中國近代經世思想研究〉（《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2期〔1986年9月〕，頁86–87）及龔來國：〈清「經世文編」研究：以編纂學為中心〉（上海：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4年，頁3–4）整理。

¹¹⁶ 章清：〈「策問」與科舉體制下對「西學」的接引〉，頁78–79。

¹¹⁷ 楊昌濟：《達化齋日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一八九九年（己亥）八月、九月，頁16–25；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光緒二十二年（1896）十一月、十二月，光緒二十三年（1897）正月、二月，頁65–70。

舉考試的地位大為提升，士子對於「經世文編」的需求也大增多，龐大的市場需求導致書賈大量編刊「經世文編」。1901年是各種「經世文編」競相湧現的時期，而引領這股潮流的是上海的石印書局如點石齋、積山書局、掃葉山房、鴻寶書局、慎記書莊、寶善齋、宜今室、雪齋書局等。¹¹⁸

科舉改制後，中外策論備受重視，八股文頓失地位。出版八股文集已不能給書商帶來利益，書商也就不再花費心思出版新編的八股文集，僅僅翻印科舉改制前影響力較大、銷路較廣的八股文集如《大題文府》、《小題文府》等。書商也把注意力從出版五言八韻試律詩，轉到出版與策論相關的舉業用書上。儘管策論體裁流傳甚久，但是對於常年習於八股文體的士子而言，仍然需要加倍努力才能掌握。《策學備纂》、《策府統宗》等書籍到了科舉改制後，已不能滿足士子的備考需求。而且四書五經大義還不得丟開，這就增加了應試士子的負擔。其中，《新政應試必讀》和《策論講義淵海》就是這形勢下的產物。《新政應試必讀》一書分六卷，各卷名目次序與上諭所列考試場次內容一致，依次為中國政治、中國史事、各國政治、各國藝學、四書義與五經義。入選的是當時流行而且適宜應試的策論，以及對四書五經義的闡釋。《策論講義淵海》共分四門，與考試場次內容幾乎一致。「一為中國政治策論，一為各國政治策論，旁及西藝格致諸論說，一為四書五經義，一為歷朝掌故論」，共五千餘篇。¹¹⁹

應試士子既要周知本國古今政治與史事，於是二十四史、九通、《綱鑑》以及各種論說，又復盛行一時。¹²⁰ 考生「無不慷慨解囊，爭相購買」當時書局所翻印的「廿四史、《九通》諸書」。¹²¹ 這些書由於是頭場命題的出處，考生都非常注意研讀，只是正襟危坐細讀這些卷帙浩繁之作的考生恐怕不多，於是書店刊印《歷代史事政治論》、《歷代史事論海》、《史鑑節要》、《通鑑便讀節本》、《綱鑑易知錄》等讀物來滿足欲走捷徑考生的需求。其中，以《綱鑑》、《通鑑》等為名的歷史讀物最易吸引士子目光，不少俗陋士子僅僅「看過《綱鑑易知錄》而已」。¹²² 除此，還有一些像《歷代史事政治論》之類大部頭的本國歷史參考書。該書共三百零八卷，二十八部。點石齋於光緒二十九年促銷此書的啟事稱：「科舉改革，鄉會試首場試以中國史論，是非胸羅全史，學識閎通，決不能於場屋中拔幟制勝。然不博觀古今名人論史之作，則識見或不能恢擴，而思議筆力恐不能縱橫馳聘，卓然成家。是編係京師大學堂、江陰南菁

¹¹⁸ 龔來國：〈清「經世文編」研究〉，頁1-4。

¹¹⁹ 《申報》，10823號（1903年6月8日），〈新印《策論講義淵海》出售〉，5版。

¹²⁰ 陸費逵：〈六十年來中國之出版業與印刷業〉，《申報月刊》第1卷第1期（1932年7月），頁14。

¹²¹ 《申報》，11173號（1904年5月27日），〈書肆概言〉，1版。

¹²² 公奴：〈金陵賣書記〉，頁312。

學堂、松江融齋精舍諸高材生分輯，依涑水《通鑑》，始於三家分晉，下迄有明。上而朝綱國政，下而吏治民生，凡經名儒碩學抒為偉論者，無不刺取編錄。集書數百種，得文數萬篇，搜羅宏富，抉擇精嚴，誠乙部之鉅觀，非徒科場之口鑰已也。」¹²³ 透露出這部書是應科舉新章而編寫的。

除要知曉本國政治歷史外，還要了解各國政事，於是各國史著隨之而風行一時。開明書店主持人夏清貽(1876–1940)光緒二十八年(1902)到南京賣書，統計所售書籍的銷售情況後發現，「以歷史為最多」，共賣三十八種八百九十三冊，恰恰與當時士子的閱讀需要成正比。據他分析，這與「此次科場，兼問各國政事」不無關係。他發現「通史一類，作新社之《萬國歷史》為最暢銷」。「此次科場之例，兼考本朝掌故，而內地之士，有語以熙、雍、乾而不知為何朝者，故如《清史攬要》、《最近支那史》之類，實可大銷，只患書之不敷耳」。餘如《十九世紀外交史》、《日本三十年史》、《現今世界大勢論》、《東亞將來大勢論》等也有買者。「凡此銷數，其大半為場屋翻檢之用」。¹²⁴

科舉改制後，頭場和三場的論題尚可分別取法揣摩現成論策和八股文名篇，可是次場的聲光化電、天文格致、公法刑律等西政西藝之學，所涉更廣，不少考生茫茫然不知從何處用功。時任貴州學政的趙惟熙(1859–1917)應學生之請，仿張之洞(1837–1909)《書目答問》體例，編寫了《西學書目答問》，「臚列西書諸目於篇，用譚來者」。其目分「政學」和「藝學」兩大類。「政學」類計收錄221種，包括史志學、政治學、學校學、法學、辨學、計學、農政學、礦政學、工政學、商政學、兵政學、船政學；「藝學」類計收151種，包括算學、圖學、格致學、化學、汽學、聲學、光學、重學、電學、天學、地學、全體學、動植物學、醫學。這個書目是趙惟熙為幫助士子備考而編，故所著錄的《萬國史記》、《泰西新史攬要》、《西國近事匯編》、《肄業要覽》、《富國策》、《西藝知新》、《味根課稿叢鈔》、《格致入門》、《天文啟蒙》、《地學啟蒙》等三百多種書籍都是士子留心研習的讀物。這些書「大半有石印巾箱本」，在書肆可以輕易購得。¹²⁵ 當時介紹西方政藝的中文專業書已有上千種之多，其中以翻譯著作為主，只是距離考生臨時抱佛腳的需要還有距離。他們急需以西方知識體系為基礎的工具書，以圖獲得功名。一些書局注意及此，援用了西方百科全書的編輯原則，編刊了不少匯集中西文明知識的百科全書來給考生備考(參表二)。¹²⁶

¹²³ 《申報》，10854號(1903年7月9日)，1版。

¹²⁴ 公奴：〈金陵賣書記〉，頁304–5。

¹²⁵ 趙惟熙：《西學書目答問·略例》，載熊月之(主編)：《晚清新學書目提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頁569–70。

¹²⁶ 劉龍心：〈從科舉到學堂——策論與晚清的知識轉型(1901–190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8期(2007年12月)，頁106–17。

表二：知見舉業用百科全書

出版年份 (光緒)	書名	編者	出版社	卷數	門類
二十七年	五大洲政治通考	急先務齋主人	急先務齋	48	10
	泰西藝學通考	何良棟	上海鴻寶書局	16	16
二十八年	萬國政治藝學叢考	朱大文、凌慶颺	上海鴻文書局	380	40
	分類時務通纂	陳昌紳	上海文瀾書局	300	6
	五大洲各國政治通考	錢恂	古餘書局	8	6
	列國政治通考	漸齋	天津開文書局	18	18
	藝學統纂	馬建忠	上海文林	88	14
	中西經濟策論通考	秦榮光	深柳讀書堂		32
二十九年	新輯增圖時務彙通	李作棟	上海崇新書局	108	11
	新學大叢書	飲冰室主人 (梁啟超)	上海積山喬記書局	120	10

這類書籍以條目形式，一詞一解，對已有的知識進行整理與概要記述。¹²⁷其中，篇幅三百八十卷之巨的《萬國政治藝學叢考》可說是較具水平的一部大型百科全書。該書上編《政治叢考》，分疆域、盛衰、交涉、度支、稅政、幣政、官制、民俗等二十考；下編《藝學叢考》，分算學、身體學、動物學、醫學、工學等亦二十考。共有條目 21,436 條。分類細致，解說清楚，還有小字注。此外，還附有收錄策論範文的《萬國政治藝學最新文編》八十卷。值得注意的是，多數百科全書編者痛感中華民族落後於世界各國，希望藉著編纂這些可供新式科舉制度用的參考書來普及知識，並與西方文化相接軌。¹²⁸

除了中外政治藝學的知識外，士子也急需一些幫助他們了解策論的格式體裁，以及可以取法的模範策文。對於朝廷改考策論，書商亦做出適時的應對策略。在回應頭場試中國政治史事論的備考需要這一端，書商或找來一些時人習作或平日的讀書筆記，或重新翻造和改編前人舊作，挑出和論策相關的主題，輯為文選、文編，例如漁陸散人的《策論秘訣》(光緒二十八年刊本)、朱晴川增評的《三蘇策論文選》(光緒二十七年有益堂刊本)等。此外，書商也蒐集上一場鄉、會試闈墨、各書院課藝及

¹²⁷ 李伯元在書中譏諷那些參加科舉的考生所要的參考書，不是要「分門別類」，就是要「簡括好查」的。見李伯元：《文明小史》(臺北：廣雅出版社，1984年)，第三十四回〈下鄉場腐儒矜秘本，開學堂志士表同心〉，頁270-71。

¹²⁸ 鍾少華：《人類知識的新工具：中日近代百科全書研究》(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6年)，頁91。

時人習作的策論彙編或選集，提供即將上場考試的考生揣摩參考(參表三)。¹²⁹

表三：知見策論彙編或選集

出版年份 (光緒)	書名	編者	出版社
二十七年	分類洋務經濟策略	仲英	介記書店
	時務目論	汧濱漁者	上海華洋印書局
	中外政藝策府統宗	譯書會主人	中西譯書會
	中外政治策論彙編	鴻寶齋主人	上海鴻寶書局
二十八年	策論經義全新	張霖如、宋錫恩	上海書局
	新輯各國政治藝學策論	自省齋主人	上海書局
	中外經世策論合纂	聽秋舊廬主人	上海鴻文書局
二十九年	中外時務策問類編大成	求是齋主人	上海求是齋
	中外策問大觀	雷瑁	硯耕山莊
三十年	中外文獻策論匯海	洪德榜	上海鴻寶齋
光緒年間	古今經世策論舉隅	邵恆照	不詳

其中《新輯各國政治藝學策論》是在廢八股詔頒佈的翌年春面世的，收集百多篇有代表性的策論範文。比較起來，《中外文獻策論匯海》更為大型，為卷七十一，收文三四千篇之多。士子熟讀此等範文，在考場雖不能完全應付裕如，但也勝於束手無策，這也注定它們成為暢銷書。

晚清的圖書市場上不乏編寫舉業用書的文人。多數舉業用書編者的名望是無法與官僚、政客、名士相提並論的，一些甚至連傳記都難以查獲，只能粗略了解，如《策學備纂》的編者吳頌炎，僅知其字亮公，浙江諸暨人而已。¹³⁰這些編者身份各異，或是小官吏，如《四書題鏡》的作者汪鯉翔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中舉後「授內閣中書，改選諸暨學諭」。¹³¹或是書院教習、村野塾師，如《四書典制類聯音註》的作者閻其淵曾擔任河南省講習，¹³²《四書古人典林》的作者江永(1681-1762)曾閉門授

¹²⁹ 章清：〈「策問」與科舉體制下對「西學」的接引〉，頁75-76；劉龍心：〈從科舉到學堂〉，頁113-15；周振鶴：〈問策與對策〉，頁114-15；周振鶴：《知者不言》(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頁236-37。

¹³⁰ 李學勤、呂文郁(主編)：《四庫大辭典》(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525。

¹³¹ 沈椿齡：《(乾隆)諸暨縣志》，《中國方志叢書》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卷二十，頁三五上。

¹³² 李蔚、王峻：《(同治)六安州志》，同治十一年(1872)刊，光緒三十年(1905)重刊本，卷三二〈儒林〉，頁一上。

徒數十年，¹³³《分類時務通纂》的編者陳昌紳曾掌管上海的龍門書院。或是號召文人編輯圖書，書成後將書挂其名的書店老闆，如鴻寶齋主人、廣益室主人、求是齋主人、急先務齋主人等。有的還是生員、舉人，像閻其淵和江永都是監生，汪鯉翔和雷瑒(1871–1941)都曾「舉於鄉考」。有的甚至是進士，如《四書味根錄》的作者金澂是嘉慶二十五年(1820)進士，《新政應試必讀》的編者吳厚焜是光緒九年(1883)進士。更有不少是屢試不第的文人，如《四書人物類典串珠》的作者臧志仁。¹³⁴至於科舉改章後的舉業用書編者多是新派文人，有的是維新派文人，如《新學大叢書》的編者梁啟超(1873–1929)；有的是外交官，如曾出使英、法、意、比四國的錢恂；有的是留歐的上層士紳，如曾留學法國的馬建忠，以及報人鄒弢(1850–1931)等。¹³⁵晚清舉業用書的編寫者可深究的問題很多，限於篇幅，將另撰文討論這個課題。

石印舉業用書的營銷與流通

晚清石印書局充分運用各種傳統與新式的宣傳手段，以及覆蓋各地的銷售網絡(包括固定的與流動的銷售方式)，並在日益發達的水陸交通運輸和郵政服務的相輔相成下，使得舉業用書呈鋪天蓋地之勢流通傳佈到全國各角落。

多管齊下的營銷方式

晚清石印書局通過多種方式宣傳促銷圖書，其一是在店裏張貼新書通告。光緒二十九年，開明書店股東王維泰「載書二十餘箱，為數計二百餘種」到汴梁趕考市，「賃考棚街屋設肆」，「將各書編分門類，寫一總目，貼之壁間」。其二是到各處張貼新書通告，不少客人也因「偶見招貼詞意」而被吸引到書店。¹³⁶一些書局也編制營業書目來宣傳圖書，像同文書局、江左書林分別在光緒十一年和十二年編制的書目冊子；¹³⁷或是單張傳單，像收錄於《晚清營業書目》中的掃葉山房、同文書局、飛鴻閣、緯文閣、十萬卷樓、鴻寶齋分局、申昌書局、寶善齋書莊等石印書籍傳單。¹³⁸書目羅列所售各式各樣的圖書和書價，讓讀者按圖索驥到書局購買。

¹³³ 江藩：《漢學師承記》，《清代傳記叢刊》本(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卷五，頁123–28。

¹³⁴ 臧志仁：《四書人物類典串珠》，《中國稀見史料》本(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7年)，寧貴：〈序〉，頁14–15。

¹³⁵ 李孝悌：〈建立新事業——晚清的百科全書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1本第3分(2010年9月)，頁655–62、675–86。

¹³⁶ 公奴：〈金陵賣書記〉，頁304–5。

¹³⁷ 同文書局(編)：《同文書局石印書目》，《中國近代古籍出版發行史料叢刊》本，頁13–17；《江左書林書籍發兌》，頁490、511–99。

¹³⁸ 周振鶴：《晚清營業書目》，頁387–526。

張貼新書通告、派發書目冊子與傳單的範圍畢竟較小，影響不大。腦筋轉得快的書商在報紙出現後，立即利用這個媒介宣傳推銷圖書。清末最耀眼的報紙非上海的《申報》莫屬。《申報》在開創時，只在上海本埠銷售，翌年在杭州設立分銷處。到1881年二月間，外埠的分銷處共有北京、天津等十七處，每天銷售的份數也從六百份左右擴大到二千份左右。到了1887年又增加了十五處分銷處，前後共計三十二處，銷數增加到七八千份。到1907年，《申報》每天銷量已增至萬餘份。¹³⁹沒有《申報》分銷處或距離分銷處較遠的地方，讀者可通過民信局訂閱。向民信局訂閱，隔一天就可以寄達，¹⁴⁰所以《申報》所刊登的新書啟事與告白的影響力不容忽視。

申報館的附屬書局點石齋也利用近水樓臺之便在《申報》刊登啟事，宣傳新書。光緒十一年五月，點石齋在《申報》促銷《增選藝林三場備要》：

國家以四書文取士，選本之多，日翻花樣，洵為士林揣摩之助，惟經義策學祇有單行並無合刊，攜帶舟車甚不簡捷，亦憾事也。茲由京都館閣文社友以校正《藝林珠玉三編》並續選，類皆清真雅正，根柢盤深，後來諸選皆無能出其右。惜原板漶漫，續刊豕魚，不惜工資，囑託本齋復校再四，付諸石印，合以精選《五經正鵠》、《策學總纂》、《近科館律》諸作，名為《三場備要》。後增丁太史曠視山房《學》、《庸》全章題文以補其缺，三場程式亦列入焉。璧合珠聯，取携良便，舉業家當亦先覩為快乎。惟是所印無多，恐不敷海內諸君購取。計每套裝訂十本，實洋二元八角正。紙張潔白，縮印精美。准於五月二十日出售，寄存上洋掃葉山房並各省書坊。如欲躉購者，請至掃葉南北號面議均可。¹⁴¹

光緒十二年(1886)十二月，點石齋刊登啟事，宣傳新出的《巧搭網珊》：

自泰西石印之法盛行，大題、小題選家林立，靡不搜羅宏富，集成藝林之大觀。惟「巧搭」一書從無專選巨帙，以供揣摩，未免闕如。茸城頌萱室主人竊有憾焉，爰取同人名手搭題窗稿以及歷屆歲科試藝，各省書院傑作，羅致極廣，剔選極精，計得巧搭文四千有奇，交本齋石印，名之曰《巧搭網珊》，其已見於向時石印諸書中者蓋從割愛。準於十二月十五出書，每部分訂八本，

¹³⁹ 徐載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報史料》，頁73。

¹⁴⁰ 包天笑回憶童年時(約1885年左右)閱讀《申報》的情景時說：由於《申報》在蘇州沒有分館、代派處，所以全城看《申報》的約百戶人家都是向民信局訂閱的。而在「蘇州看到上海的《申報》，並不遲慢，昨天中午所出的報，今天下午三四點鐘，蘇州已可看到了」。當時蘇滬之間雖沒有通行小火輪，民信局每天用一種「腳划船」飛送，「所有信件以及輕便的貨物，在十餘個鐘頭之間，蘇滬兩處，便可以送達」。詳參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讀書與看報〉，頁105-6。

¹⁴¹ 《申報》，4383號(1885年6月28日)，1版。

定價洋四元四角，在上海南北申昌及各書坊，外埠申昌發售。如願躉購者，問法大馬路南申昌面議，價從格外。¹⁴²

申報館除刊登它及其附屬機構的書籍啟事外，也刊登同業競爭者如同文書局、蜚英館、千頃堂、江左書林、積山書局、袖海山房、萬選樓、鴻寶齋等的新書啟事。

呂佳指出，《申報》創辦初期的廣告多以簡單的文字廣告為主，直接介紹產品功能。¹⁴³這種情況也表現在書籍啟事上。這些廣告創意雖有限，但都利用了直接簡練的文字，傳達像新書的銷售時間、價格、地點、購買途徑等各種信息。

另外，石印書局所刊登的啟事也著重渲染產品的品質與特點，打消潛在讀者的疑慮，放心購買。除強調所印書的校對如何精審，字跡如何清晰，紙墨如何精妙，攜帶如何輕便，更較其他同類書的編輯「格外認真」外，若是彙編的話，也強調在搜集時莫不博採廣搜，編輯時仔細去蕪存菁，「習見文字概屏弗錄」，「務擇花樣嶄新，最利場屋」的文章，以供揣摩。¹⁴⁴若市場上已有類似的圖書，書局在其啟事中也忘貶低競爭者的不足之處，突出自家的獨特之處，以吸引讀者。像點石齋在促銷《新選石印小題宗海》的啟事中批評「時下選本疊出」，「此竄彼竊，陳陳相因，間有佳文亦數見而不鮮」。新選石印《小題宗海》則判然有別，編者「獨闢新裁，爰集同志，各出平時所作小題窗課，並取歷屆試草以及各處社課，薈萃書院課與名家稿本、時賢摘本，親自校讎，嚴定去取。凡文不極其佳，而題不及其難者，蓋置弗錄。其已見於《小題文藪》、《小搭精華》等集者更不闖入一文，並不相犯一題，滲淡經營，力闢雷同，立避習見，約之又約，精之又精」，最終「得文一萬六千餘首」。¹⁴⁵

為了引人矚目，加快銷售的節奏，以及擴增銷售數量，石印書局也在報章啟事中加插「所印不多，祈速購為盼」；「所印無多，諸君子請早賜顧」；「想諸君當無不爭先快靚」等辭句，¹⁴⁶製造爭購的氣氛。也製造暢銷的景象，如〈重印《增廣策學總集大成》出書告白〉說：「聞見齋主人延請名宿，悉心校勘，曾經印行，早邀士林賞購已罄矣。」「爰特重印刻已出書，字跡尤清」，敦促潛在讀者可到「申昌掃葉山房、江左書林及各書坊」購買。¹⁴⁷

舉業用書的銷售網絡極為廣泛，像點石齋出版的舉業用書除可在上海所設的書局購得外，也可在申報館的附屬書局申昌書局，上海的其他書局如掃葉山房、鴻文

¹⁴² 同上注，4941號（1887年1月14日），1版。

¹⁴³ 呂佳：〈《申報》廣告設計風格演變探析〉（蘇州：蘇州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頁11-14。

¹⁴⁴ 《申報》，5027號（1887年4月17日），4版。

¹⁴⁵ 同上注，4427號（1885年8月11日），1版。

¹⁴⁶ 同上注，6804號（1892年4月3日），1版；4409號（1885年7月24日），1版；4707號（1886年5月25日），1版。

¹⁴⁷ 同上注，5375號（1888年4月8日），1版。

書局、江左書林、文瑞樓、醉六堂、千頃堂、著易堂、文玉山房、三蒼書局、暢懷書屋、芸緗閣等購買得到。點石齋在光緒中葉已發展成為上海規模最大的出版機構，其書籍不僅可在本埠購得，也可通過外埠所設分鋪，包括京都琉璃廠、漢口黃陂街、廣東雙門底、福建鼓樓前、蘇州元妙觀前、金陵東牌樓、杭州青雲街、湖北三道街、湖南省府正街、四川重慶府陝西街、成都省城學道街、河南省城鴻影巷街，以及江西、山東、山西、陝西、雲南、甘肅、廣西、貴州省城等二十多處購得。¹⁴⁸其分鋪辦理「一切石印經史子集，兼售各局諸書以及中外輿圖、西文書籍、名人碑帖、畫譜楹聯」，「冊頁花色齊全，價目克己」。¹⁴⁹此外，外埠讀者可選擇通過賣報人¹⁵⁰、商號以及書報業代售處等途徑購買到它出版的圖書。¹⁵¹

其他石印書局的銷售網絡也極為健全，覆蓋面極為寬廣，如同文書局開設在上海虹口，又「分設二馬路橫街、京都琉璃廠、四川成都府、重慶府、廣東雙門底，其餘金陵、浙江、福建、江西、廣西、湖南、湖北、雲南、貴州、陝西、河南、山東、山西均有分局發兌」；¹⁵²鴻文書局「開設上海四馬路西」，又「分設棋盤街、蘇城元妙觀前及京都、金陵、浙江、福建、廣東、四川、湖南、湖北各省城」；¹⁵³江左書林開設在上洋四馬路中，其所刊書籍「上自京畿、遼、瀋，下逮閩、廣、楚、豫，通達無間」。¹⁵⁴

舉業用書不只在固定書局發售，在臨時書局分店和考場外的臨時書攤中也可買到。光緒十一年七月，《申報》刊登的掃葉山房啟事稱：「今當大比之年，除江浙兩省屆時分設〔臨時分店〕外，湖北武昌亦往〔設〕分店。」¹⁵⁵另外，每逢院、鄉、會試時，都有大量書商雲集考場附近，形成一個繁榮的圖書市場。這些書商或「稅民舍於場前」，或搭一個簡單書棚，或在空地上擺一個書攤。¹⁵⁶這種考市供應方式在當時相當

¹⁴⁸ 同上注，5838號（1889年7月21日），〈點石齋各省分莊售書告白〉，1版。

¹⁴⁹ 同上注，5791號（1889年6月4日），1版。

¹⁵⁰ 申報館在《申報》1889號（1878年6月22日）刊登〈新書出售〉告白稱：「本館排印各書籍在上海由本帳房與賣《申報》人發兌，外埠專歸賣報人經理。」（1版）

¹⁵¹ 商號有天津紫竹林沈竹君處，南京東邊營林宅內李佑子處，蘇州都亭橋銅錫店內黃呈齋處，興國李正忠處，福州南臺復利洋行內，寧波江北李勝記號，武昌糧道街夏德興雜貨店等等。書報業代售處則有香港的循環日報館，廣州的文選樓，揚州的治平報房、興隆庵北首的劉承恩報房和洪毛司巷的興隆報房等等。參閱〈點石齋申昌書室廣告五件〉，頁214-15。

¹⁵² 〈上海同文書局石印書畫圖帖〉，載《晚清營業書目》，頁401。

¹⁵³ 《申報》，5524號（1888年9月4日），6版。

¹⁵⁴ 同上注，5034號（1888年9月14日），4版。

¹⁵⁵ 同上注，4443號（1885年9月2日），4版。

¹⁵⁶ 胡應麟：《經籍會通》（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卷四，頁49。

普遍，每逢考試之年，書商都會爭做考生的生意，¹⁵⁷像千頃堂書局就非常積極地開展考場供應工作。遇到考試之年，千頃堂書局往往會在考棚設有臨時書店，尤其是浙江的杭、嘉、湖、寧、紹、臺、金、衢、嚴、溫、處十一府，都有千頃堂臨時書店。包天笑回顧蘇州考市中的書鋪說：「他們都租借人家的牆門間，設立一個簡單的鋪位。幾口白木的書架，裝滿了書，櫃檯也沒有，用幾塊檯板，套上個藍布套子。招牌用木板糊上白紙，寫上幾個大字，卻是名人手筆。這時觀前街的幾家書店，也都到這裏來，設立臨時書店了。若到了府考、道考的時候，更為熱鬧，因為常熟、吳江、崑山的考生都要來。也有上海的書店，他們是專做趕考生意的。」¹⁵⁸光緒十九年，《申報》報道青雲街考市云：「杭垣考市皆聚集於貢院西首青雲街地方，今秋尤為熱鬧。各店鋪之開設者，東至三角蕩文昌閣止，西至橫街觀橋清遠橋止，南至仙林橋五福樓長慶街止，西南至登雲橋有玉橋止，東西南三隅折而算之約有二里之遙。惟書坊最多，玉器翡翠店次之，骨董店又次之，其餘筆店、墨店、磁器店、紅木店、洋貨店、扇店、考具店、食物店、照相店、洋漆店不一而足。士女之游觀者摩肩接踵，途為之塞。丹桂軒茶園自午後至上燈時，幾無插足之地，亦云盛已。」¹⁵⁹在考市期間，「杭人相見，輒以『曾否遊青雲街』為問。其熱鬧的景象一至延續到「三場既畢，遠道考生大都歸去」時，青雲街才恢復到「寂靜如平時」。¹⁶⁰

直至科舉考試廢止前的幾年，各地考市的盛況依舊不減。據報道，杭州在光緒二十八年「舉行鄉試之時，各屬士子紛紛來省應試，以及各業之攜貨謀利者陸續踵至，統計不下萬餘人，以致市上百物無不騰貴」。至於「所開各店，惟書肆多至五十餘家。雖生涯不若去年之盛，而顧問者尚不乏人」¹⁶¹。稍後再統計，發現「前已開設五十餘家，茲又續開二十餘鋪」，¹⁶²可見考市盛況之一斑。陸費達（1886–1941）曾對此加以介紹：「平時生意不多，大家都注意『趕考』，即某省鄉試、某府院考時，各書賈趕去做臨時商店，做兩三個月生意。應考的人不必說了，當然多少買點書。」¹⁶³考市也吸引附近的士子前往購書，像住在鄂縣的朱峙三聽聞黃州有考市，「武漢各大書店俱來黃州租屋趕考」，立即與父親商量坐渡到黃州考市購買舉業用書。¹⁶⁴

書商也往往趁考市大賺一筆，分文不肯讓步。王維泰〈汴梁賣書記〉記：「場前買書者，都為臨文調查之用。有客買一書少三十餘文，堅不肯補，因詢之曰：『汝書

¹⁵⁷ 高信成：《中國圖書發行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212。

¹⁵⁸ 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考市〉，頁89–90。

¹⁵⁹ 《申報》，7320號（1893年9月6日），〈青雲街考市〉，2版。

¹⁶⁰ 鍾毓龍：《科場回憶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58、81。

¹⁶¹ 《申報》，10919號（1903年9月12日），〈武林考市〉，9版。

¹⁶² 同上注，10938號（1903年10月1日），3版。

¹⁶³ 陸費達：《六十年來中國之出版業與印刷業》，頁14–15。

¹⁶⁴ 〈朱峙三日記（連載第二）〉，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初十日，頁298。

為場中用乎，抑窗下用乎？」則曰：『入場所需也。』復曉之曰：『既臨文急需，不必爭此區區；如窗下用，也不妨預算資斧，俟以異日。』乃如數納訖取書去。¹⁶⁵又或漫天開價，然後減價出售。《文明小史》描述窮酸秀才到書賈王毓生在濟南考市開的店裏買石印《史論三萬卷》，夥計「見他沉吟，不敢多討，只要三兩銀子一部」。秀才覺得太貴，最初只願意出一兩五錢，最後加到一兩八錢。王毓生見秀才可憐，又是第一注買賣，「合算起來，已賺了一半不止」，就吩咐夥計把書賣給他。由於四遠的書賈都來趕考，競爭激烈，王毓生在考市後結算帳目發現「纔只做了幾十兩銀子的買賣，盤纏、水腳、房飯開銷合起來，要折一百多銀子」。¹⁶⁶由此可見，趕考市也難保穩賺不賠。

四通八達的流通管道

晚清石印書局所以能夠建立起如此龐大的銷售網絡，與當時交通運輸的發展息息相關。在清政府的扶持與獎勵下，洋務運動時期創辦的鐵路、輪船、郵政等交通與郵電事業得到進一步的發展。自光緒二年(1876)吳淞鐵路建成以來，全國鐵路通車總里程從最初的數公里擴大到1911年的九千多公里，大大地便利了物品的輸送。¹⁶⁷同治十一年(1872)，李鴻章(1823-1901)在上海創辦輪船招商局，並在天津、牛莊、煙臺、漢口、福州、廣州、香港等處設立分局。進入二十世紀，中國輪船航運業由輪船招商局以及英國的怡和、太古輪船公司三家壟斷經營。當時許多報紙既發佈火車營運時刻表，也公佈輪船航班的進出港信息。這種定期航班的開通，有助於各書局合理適時地安排圖書發行。¹⁶⁸光緒二十三年(1897)，各地先後興辦了不少沿海及內河小輪公司，給各書局提供了輸送圖書的多一項選擇。¹⁶⁹經過三十餘年的發展，火車和輪船的營運已進入相當成熟的階段，運輸能力也得到了很大提高。當時的民營書局沒有錯失善加利用現代交通工具的優勢，開始使用火車和輪船將圖書運送到全國各地。光緒二十九年，王維泰往河南開封趕考市，售賣新書。他記錄其前往河南開封趕考市的沿途經歷說：「金陵賣書後，同人相約作汴梁之遊，藉開風氣。於正

¹⁶⁵ 王維泰：〈汴梁賣書記〉，載《中國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三卷，頁320。

¹⁶⁶ 《文明小史》，第三十四回〈下鄉場腐儒矜秘本，開學堂志士表同心〉，頁269-72。

¹⁶⁷ 李占才(主編)：《中國鐵路史(1876-1949)》(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2。關於中國鐵路從1881至1949年間的總里程變化，可參閱同書所附〈歷代鐵路興建里程表〉，頁590-92。

¹⁶⁸ 黃林：《晚清新政時期圖書出版業研究》(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267-69。

¹⁶⁹ 中國航海學會：《中國航海史(近代航海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頁155-58。

月杪載書二十餘箱，為數計二百餘種，趁輪啟行。初四到漢口，留一日，初六乘火車至信陽。先是，函託南汝光道署戚友臨時招待，是日車抵站，承派人來接，並預備客寓車輛，頗安適。翌日大雪，留四日，至十一開車，十八日抵汴城。」¹⁷⁰王維泰一行人從水陸兩路，花費半個月的時間將二十餘箱圖書送往開封考市銷售。如此多的書，如此長的路，如果像舊時那樣依靠馬車、小船、木筏來運送，就可能得花上更多時間。

外埠讀者也可通過郵筒傳遞的方式訂購圖書。現代郵政出現以前，民信局所提供的郵遞服務也是石印書局利用來讓圖書傳播到遠無分局之處的手段。民信局是重要的民間通信組織，約產生於明永樂年間（1408–1425），專門傳遞民間郵件。¹⁷¹從同治初年開始，整個中國已達到「大而都會，小而鎮市」，「東西南北，無不設立」民信局的地步。¹⁷²「雖遠至邊陲如遼東、陝、甘、新疆各省，亦無不有民信局之設立」。¹⁷³「寄信多的商號和住宅，信寫好了，不必親自送信局，他們每天下午，自有信差來收取。這些信差，都是每天走熟了的，比後來郵局的信差還熟練」。「他們並沒有什麼掛號信、保險信，卻是萬無一失」。¹⁷⁴在此期間民信局形成遍及全國經濟比較發達地區的通信網絡，對於人們的書信傳遞、信息溝通和貨物交流起了極大作用，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¹⁷⁵點石齋在報章上刊登〈點石齋申昌書局圖書可託信局代辦啟〉云：「本館於各省分立代賣書籍之局雖已叢繁，然究難周遍。恐有遠無分局之處，苦難購取者，則請託信局代買。遞寄極為妥便，可以無虞。」例如在南寧、沙市、長沙、湘潭、重慶、益陽、南昌的胡萬昌信局，保定、南昌的全泰盛信局，武穴的億大信局，九江的泰古晉信局，南昌的乾昌信局、恆源信局、興昌祥信局，邵伯的政大信局，以及鎮江的各信局，讀者都可託它們代買點石齋和申昌書局出版的圖書。¹⁷⁶光緒二十二年（1896），光緒帝（1875–1908在位）頒佈上諭成立全國郵政。在清政府的扶持下，官郵發展快速，其網點不僅遍佈通商口岸的周圍，還迅速地向內陸地區延伸，甚至比民信局更為深入。¹⁷⁷現代郵政的發展，又使書刊的傳遞延伸至郵政網絡所能覆蓋的廣大區域，包括那些沒有開設書店分局的鄉村。¹⁷⁸石印書局

¹⁷⁰ 王維泰：〈汴梁賣書記〉，頁319。

¹⁷¹ 北京師聯教育研究所：《中國古代驛站與郵傳》（北京：學苑音像出版社，2005年），頁75。

¹⁷² 《清稗類鈔》，〈信局〉，頁2290。

¹⁷³ 王樾：《郵政》，《萬有文庫》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年），頁124。

¹⁷⁴ 包天笑：〈讀書與看報〉，頁105。

¹⁷⁵ 徐建國：〈近代民信局的空間網絡分析〉，《中國經濟史研究》2008年第3期，頁153。

¹⁷⁶ 〈點石齋申昌書室廣告五件〉，頁208。

¹⁷⁷ 徐建國：〈清末官辦郵政與民信局的關係研究（1896–1911）〉，《重慶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1期，頁51。

¹⁷⁸ 吳永貴：《民國出版史》，頁40。

充分注意到郵政的便利，使用它來遞送讀者所訂閱的圖書，有些甚至還承諾「價歸一律，以誌不欺」。¹⁷⁹

結語

自坊刻舉業用書出現以來，民間書坊在追求商業利益的前提下，無不希望在讀者群體極為龐大、競爭極其激烈的這類圖書的市場分一杯羹，從而謀取最豐厚的利潤。在朝野反對科舉制度的聲浪下，晚清上海民營石印書局以其敏銳的市場洞察力，緊隨晚清考試內容的變化，援用石印術的優勢，生產了林林總總、經濟實惠、體積輕巧、便於攜帶的舉業用書，來滿足年輕考生居家遠行時備戰科場、挾代作弊的需求。

銷售石印圖書的書局為了促銷圖書，一方面在店裏張貼新書告示，在店外派發圖書目錄，另一方面也將注意力多放在日趨重要的全國性報章，像在《申報》刊登新書預告與出售啟事。圖書銷售也不局限在本埠的固定店面，而利用新式交通運輸方式，將圖書載送到全國各地書局、分局、代售處以及考市等。現代郵政出現以前，石印書局也藉著民信局所提供的郵遞服務，把圖書運到遠無分局之處。全國郵政設立後，取得迅速發展，石印書局於是加以利用來遞送讀者所訂閱的圖書。

不過，石印業的黃金時代僅維持了二十多年，其優勢地位即被已改良的鉛印技術所取代。¹⁸⁰民營石印書局在科舉考試施行期間大獲其利，故而不乏書局將重心投入在舉業用書的出版上。「光緒三十一年(1905)八月，科舉制度完全廢止。從此，先前有關功名進取的石印科舉用書一律失去了市場」，「考試的書原售一、二元的，此時一、二角也無人要。大的石印書莊，因考試書的倒霉，都關門了」。¹⁸¹石印業幾乎全軍覆沒，像鴻文書局以雄厚的資金專印舉業用書，初期亦曾風行一時，從中牟取厚利。「迨戊戌政變，八股文既廢，大題、小題等書如同垃圾。然猶掙扎圖存，改編尊王攘夷的策、論、義諸書，可是已成強弩之末。隨後清政府終於廢除科舉，因此這種八股文學無人過問，鴻文書局損失不小。民國成立後，曾謀改弦更張，出版教科書，因乏資金，乃將石印書局出盤於吳某，改印舊小說。未及又將棋盤街的發行所出盤，全部資產葬送在封建文藝中」。¹⁸²鴻文書局以外，以刊印科舉書為主的蜚英館同樣也一蹶不振，最後「只剩幾家專印古書或小說的小石印書坊」。¹⁸³這些石印書局幾乎把所有在資源都放在舉業用書的生產上，當與這些讀物相依相存的科舉制度瓦解之際，來不及應變，加上庫存過剩，資金周轉不靈，只有以失敗告終。

¹⁷⁹ 《江左書林書籍發兌》，頁490。

¹⁸⁰ 韓琦、王揚宗：〈石印術的傳入與興衰〉，頁401。

¹⁸¹ 陸費達：〈六十年來中國之出版業與印刷業〉，頁15。

¹⁸² 秋翁：〈六十年前上海出版界怪現象〉，頁267-68。

¹⁸³ 陸費達：〈六十年來中國之出版業與印刷業〉，頁15。

也有一些石印書店在生死邊緣徘徊掙扎後生存下來的，像掃葉山房在同光年間順應士人渴望科舉功名的時代風氣，改用石印術生產舉業用書，但同時也翻刻他本以及清人著述。經歷了多次危機，既有政局變動，又有社會經濟恐慌，還有戰事破壞，其中以科舉制度的廢除給予書局最嚴峻的考驗。1918年，掃葉山房描述書店在面臨科舉改制之後的發展歷程時說：「科舉即廢，新政聿興，革裝書籍，挾新思潮以輸入，活板印刷盛極一時。故籍陳論，束諸高閣，而石印書亦受影響。」稱幸的是，中國「立國五千年，其文明蘊蓄者深且久，縱或一時停頓，決無終廢之理。古學復興，今其時矣。第以政體屢變，海內雲擾，板本摧毀，手民流散；而一二石印精本，始見重於當世之大士夫，紙墨煥然，歷歲如新，乃信成之速而傳之久者，石印兼擅其勝」。¹⁸⁴科舉廢止後，由於新學堂需要傳統的文學讀本來做為教科書，故掃葉山房在清末民初間採用石印出版了一些文學讀本供學堂使用，如《清朝文錄》在光緒二十六年（1900）初版，之後還重印了三次。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前，掃葉山房還出版了不少詩文總集如《漢魏六朝名家集》、《唐詩百名家集》、《隨園女弟子詩選》、《歷朝名媛詩詞》等、詩文別集如王琦輯註的《李太白全集》、仇兆鰲輯註的《杜詩詳註》、紀昀評點的《蘇文忠公詩集》、雷瑠註釋的《箋註隨園詩話》，以及筆記如《老學庵筆記》、《香祖筆記》、《閱微草堂筆記》等。不只滿足國內市場的需求，還行銷到日本等國。¹⁸⁵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展後，掃葉山房因出版方針未能與時並進，業務漸趨衰落，苟延殘喘至1955年宣告歇業。

最後，值得關注的一個問題是，一些舉業用書如「經世文編」系列作品、西學著述等在晚清科舉改制前僅為少數有識之士所知。直至甲午戰敗後，士大夫始有群體性的覺醒，渴求西學新知，並效法歐美、日本，改良中國固有的政教制度，逐漸衍為思想界的潮流。晚清新政時期的科舉改良，適應了這種思想變化的內在需求，由此催生出大量的西學彙編、外國史著，以及西學色彩愈來愈濃的「經世文編」續作和「百科全書」式參考書，與考生朝夕相伴。這些著述雖多數純為考生而作，用過即棄若敝履，但對士大夫階級新思想的孕育與新知識的灌輸所起的積極作用，亦是我們必須正視的。

¹⁸⁴ 掃葉山房（編）：《掃葉山房發行石印精本書籍目錄》，民國十二年（1923）重訂民國七年（1918）本。轉引自楊麗瑩：〈掃葉山房史研究〉，頁80。

¹⁸⁵ 楊麗瑩：〈掃葉山房史研究〉，頁80-84。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of Lithographic-printed Examination Aid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Private Lithographic Publishers in Shanghai from 1880 to 1905

(Abstract)

Sim Chuin Peng

Lithography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from the Wes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s the new technique made it possible to produce large volume printing without compromising on quality, publishers made use of it to produce cheap and reduced-size editions of aids important for candidates preparing for official examinations. Included in such materials were commentaries on the *Four Books* and the Five Classics, selections from essays of successful candidates at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weimo* 闡墨), anthologies of eight-legged essays, poems and political essays, encyclopedias, compilations of Western learning (*Xixue* 西學), and writings on statecraft (*Jingshi wenbian* 經世文編).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of lithographic-printed examination aids by publishers in Shanghai from 1880 to 1905. It argues that, to meet the needs of candidates, publishers produced the aid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urricular format prescribed for provincial and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s. It also notes that they took advantage of the new print media—in particular, newspapers (such as *Shenbao* 申報)—to market their examination aids, and the modern transportation systems and postal services to expand their sales.

關鍵詞：晚清 上海 石印書局 舉業用書 科舉制度 圖書生產 圖書流通

Keywords: late Qing dynasty, Shanghai, lithographic publishers, examination aids, examination system, book production, book circulation

